■文学·艺术研究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辨析与启示

齐安瑾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西安 710065)

摘 要:胡适一生致力于哲学、历史研究,其思想观念中的理性、反思、思辨色彩反而促成了在文学思想史领域的辉煌成就。《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他带领大众进入中国近代文学的纲领性文件。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有怎样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创作中即坚持怎样的创作规范,因此其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反思胡适的文学思想史观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有利于分析并认识当前学界对于文学观念、文学本质、文学意义、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等范畴与命题的思考。

关键词:胡适;文学史观;启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16)09-0082-05

PDF **获取**: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 **doi**: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9.018

The Discrimi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Literature Improvement of Hu Shi

QI An-jin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an* 710065, *China*)

Abstract: Hu Shi devoted his life to Philosophy and history, and therefore got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The literature improvement was the programmatic document, which brought the public into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u Shi's opinion have caused a widespread influence in China,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to the modern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udies Hu Shi's literary thoughts which was beneficial to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thoughts history. It also analyzed its many categories, such as literary ideas, literary essence, literary significa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and the society.

Key words: Hu Shi; Literary history; realistic meaning

胡适(1891-1962)是我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思想家之一。他师从杜威先生,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学术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在哲学、文学、历史、政治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上世纪前期的中国,他革故鼎新的积极态度与孜孜不倦在学术领域的建设引发并推动了中国学术史上史无前例的讨论与进步。胡适曾说他的职业是哲学,兴趣是文学。当然,职业与兴趣,没有孰是孰非,也没有孰高孰低之分,事实上一般人只要对于职业有深入的钻研,对兴趣反而会有更为独到的见解。胡适即是如此,拥有哲学、历史研究的根基,观念中的理性、反思、思辨、逻辑亦促成了他在文学领域颇有建树。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以下简称《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引发了学界关于白话文学、文学革命、文学本质的讨论。之后,他于1924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35年写《建

收稿日期:2015-12-15

作者简介:齐安瑾,女,陕西靖边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现代代文学。

设的文学革命论》,继续致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史观的建设。此外,他也喜欢文学创作,有诗集《尝试集》,散文《南游杂记》,中篇章回小说《真如岛》及《东洋车夫》、《爱情之动人》、《苦学生》、《差不多先生传》、《我的车和我的车夫》几个白话短篇小说,正如钱玄同所言,他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提倡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人。胡适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自己有怎样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创作中即坚持怎样的创作规范,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

一、文学创作要有可操作性强的文学规范可参照

胡适《刍议》旨在文学改良,然而文学改良的首要前提就是语言文字的改良,但《刍议》一文却是古文写成。以一篇古文来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进行自由创作,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在文中,接触了西方自由体文学的胡适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规范,至今对于文学创作都有所助益。

胡适在文中称,他经过认真研思及与友朋辩论之后得出结论,文学改良必须从"八事"入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而且在他看来,此八事都是"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1]15 虽然这八事总结并不新鲜,每一条都能在诗论、史论中找到影子,但的确如他本人所言,此八条规范,清晰明了,直指文学最根本处。

事实上在《刍议》发表一年前,胡适在《寄陈独秀》一信中已经简要阐释过"八事"理论,发表于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在信中,胡适说明他在寄给他的《新青年》旧报中读到某君的一首长律,诗中使用古典套语至少涉及一百事,且不论诗句本身格调不高,仅以用典而言,单句用典不当,上下用典不切,文法不通等问题层出不穷。但报中记者按语却将此首长律推为代表国人精神的希世之音,胡适认为这与陈独秀"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1的理念相矛盾、相违背,实在不能苟同。在他看来,当时文学之腐败已经达到极点了:最下品者为追随押韵;其次如南社中夸而不实,滥而不精,淫琐浮夸,无可称道;再进如南社陈伯严等之流,随被推崇,但均为观摩古人,并求达到神似地步,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品而已。就他追寻文学堕落之原因,莫过于"文胜质"一语,即"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1]3 如何来拯救?胡适认为,"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1]3 所以他列出此八事原则,并且将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简而言之,胡适旨在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于文于人均如此。

因此,与《寄陈独秀》一文中将"言之有物"列为第八条不同,在《刍议》中,胡适将之改列为第一条,更显振聋发聩之意味。显然,在西方哲学、西方文学的浸淫下,胡适对于"物"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古代文论,在他看来,"须言之有物"的"物"有两项核心内容,一为情感,二为思想。在此,胡适为文学立了一条公式:文学=情感+思想。他说:"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1]5)"思想",包含"见地、识力、理想",[1]5 "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1]5 人类思想的传达可以通过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共同努力,非仅靠文学的力量,但文学能在传达思想、构建人类智慧层面发挥作用则会显得尤为珍贵难得,也会更有历史价值;当然,思想本身能有文学的气息韵味会显得更为雅致,如庄周之文与杜甫之诗,前者是道家避世哲学的经典,后者是儒家入仕理想的呼歌,借助优美的文辞传达出来的哲思妙想更有韵味。所以他感叹道:"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1]5 可想而知,人如果没有思想,即使面容姣好,也只是花架子一枚,没有实质的内涵。

如此,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思想是文学的脑筋,文学如果没有了情感、思想,岂不成了没有灵魂没有脑筋的空壳?即使容貌娇美、体态丰盈又有何益?舍本逐末而已。而且在胡适看来,近世文学的衰微,就是因为"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言之无物"。[1]5 要想拯救此弊端,第一要务就是以质胜文,质即情感与思想。他将"言之有物"列为八事之第一,确实是他深思熟虑之文学改良的第一要务,简要的论述使人明了内涵,无论于研究还是于创作都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

之后,他以文学随时代不断进化之理提出"不摹仿古人",主张"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1]6 这一言论自然坚定并鼓舞了生逢其时的文学创作者的心灵,让他们坚定地选择了文学的方向。"讲求文法"、"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条,胡适都作出了细致详实的说明,很容易令人掌

握。“不作无病之呻吟”实质仍然属于文学思想、精神建设层面的内容，胡适单独将之提出更见其焦虑与苦心，告诫文学创作不能执著于这样一股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报效多灾多难的国家，只知感伤时事，呻吟牢骚。总体而言，条条都精炼明晰，至今看来都是操作性极强、容易理解掌握的文学规范。

对于《刍议》中的“八事”原则，胡适自称：“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1]15包括，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即言：“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1]3可见他对于这八条主张于发表之后可能在国内外华人学术圈触发的影响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因此他名之为“刍议”，认为这只是一个未定草案，“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1]15然而，尽管对其中部分条目抱有疑惑，白话文写作已经默默深入人心了。

胡适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越来越多的人用白话文写作。仅1919年一年，全国出现了四百多种白话报。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白话文。很快，文学界的辉煌也接踵而至：周作人、俞平伯、郁达夫、鲁迅、刘半农等都开始用白话写作。[2]105白话战胜文言应该说是大势所趋，就文学而言，我国明清时期就出现了白话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都是极好的例证。但大范围、大规模的白话文写作，还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之下，在学者们身体力行从思想、行文等层面矫枉过正的号召之下，白话文终于一举攻克了文人的头脑，使他们不再受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束缚，开始创造新时代的文学，开始思索新时代的文学。胡适1910年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不久改入文学院，并于1914年毕业。在西方文学的熏陶浸淫之下，他自然对中国古典文学如何进入现代文明有了更为直接且更为深刻的感悟，加之天赋、魄力与热情，他选择从文学规范入手来改造人们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无疑是一条最为有效的途径。但他的目标不在文学规范的树立，而在于对文学本质的思考，从思想上改变人们的文学立场。

二、新文化运动给予文学的历史意义乃思想观念的创新

新文化运动始于文学，但它对于文学的真正意义，不仅仅在于推进了文体、文学形态的变迁，而在于促进了文学思想的建设。在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一批思想家的努力下，近代文学思想史在思想表达层面突破了层层阻碍，不再晦涩，不再冗长，而是浅显直白、易于理解，易于掌握。如此，思想的力量才一步步发挥出变革历史、变化心性的作用。胡适《刍议》等一系列文章的核心主张即在于探求文学本质，探求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他的主张无疑有着很强的时代感，因为在他与陈独秀等人看来，文学革命的本质就是建立新文学，这个“新”的首要任务就是语言的新、规范章法的新，根本内容则是思想的新、心灵的不受束缚、精神的自由，而后者对于任何时代文学事业的推进都有着极大的意义。

陈独秀在《刍议》发表一个月之后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但却高扬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确立了文学革命的宣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17 1917年5月，胡适读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又给他去信一封，叙述对陈文三大主义的推崇以及对林琴南、钱玄同文学见解的同异。后还述及他“实地试验”的白话诗词集《尝试集》，之所以名“尝试”即是借鉴陆放翁“尝试成功自古无”一句，可见其开拓新局面的豪勇之气。

同期，胡适还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阐述“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30的主张。以上陈、胡、钱诸文都还属于古文，虽然内容为新，但行文运笔都还是古文气息。至1918年，《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文书写。胡适也更积极起来，于1918年4月发表了白话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将《刍议》中的“八事”原则明确为“八不主义”。胡适声称，他的《建设文学论》的主旨就是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在他看来，所谓的文学革命，就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即白话，国语才算真正的国语。只有通过文学，国语才有生命，才有价值，才能发达。而中国两千年来，只有接近白话或者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才是活文学，其他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用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白话文的表达方式使胡适的八项主张及死文学与活文学等文学观念更加犀利，也更具号召力，更能深入人心。

在《刍议》中，胡适以南社陈伯严的一首五律作为文学赝品的批判对象。认为陈伯严“涛园抄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1]7是摹仿

古人心理的绝佳代表,认为以陈为首的第一流诗人们都是以“半岁秃千毫”的功夫“作古人的抄胥奴婢”。[1]7 如果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1]7 可见胡适对于摹仿古人的文学创作者们是何等鄙夷与不屑。当然,文学史观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但用文学史观来阐释文学现象时,也不能忽略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我们要避免让文学史现象只作为阐释某种史观概念的材料,而是要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3] 胡适此论自然也有矫枉过正之处,为了论证他建立新文学——白话小说的重要意义,清代同光诗人中的魁首、陈寅恪之父陈散原成为反证,多少有些冤枉。胡适认为,只有白话小说从不摹拟古人,只是实写社会情状,因此堪与世界第一流文学相较,有志于文学的人都应该在如何创作白话小说上面下工夫。抛却对古人崇拜的奴性,致力于新时代的新语言、新文学,这样才能实现文学真正的变革。

而且在“务去烂调套语”一条中,他强调作者要“自己铸词状物”,[1]9 即要有想象力,要有创造力,能凝练出新词新语来。他说:“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功夫。”[1]9 胡适如此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大概是因为希望它得以被发扬光大,太过心切,相较古文而言,大有严以律人宽以待己之感。事实上,文言写作远没有胡适所言之言不及义,白话文写作也远没有胡适所言之容易,但在时代转型时期,任何一种制度、规范的实施都是先让人们先都进入到制度规范的限制范围之内,何况是一种新语言的使用呢。胡适的策略大概是让大家先接受,如此简易、便于操作的白话文,“我手写我口”,[2]162 你手写你口,完全是自由心灵的表达,有谁能抗拒得了呢。

《尝试集》即是他文学主张的实验产品,三年左右的白话诗创作。在最初的一年里,他无论怎样大胆,终究也没有跳出旧诗的范围,不自觉地就受到了古典诗歌五言、七言、句法整齐的限制,被钱玄同评为“未能脱尽文言的窠臼”。[4]29 如《蝴蝶》一首:“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4]50 俨然一首没有韵脚的五言律诗。在第二编中,胡适经过了一系列的反思、突破之后,开始“诗体的大解放”,[4]30 即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都打破,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话本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他也想通了一个问题,真正的白话诗,如果充分使用白话字,白话的文法,那就得是长短不一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这一时期,他的诗逐渐有了西方现代派诗的色彩,可长可短,通畅自然。如《鸽子》一诗:“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中游戏。看他们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十分鲜丽!”[4]73 读来倒是有一番清丽旷远之感。提倡白话文已然成为胡适生命中的重要项目。据《南游杂忆》记述,胡适在香港演讲时,对于香港教育发展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那就是增加白话文的教育力度,通过语言变革来加速文学革命。

在他带有一定自传体性质的《逼上梁山》中提到,梅覲庄(光迪)反对胡适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这样的观念,而胡适在“最守旧”的梅覲庄的反对下也才开始细想自己的立场,他们在讨论中曾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所以他也成人,“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他们乱谈谈出来。[5] 胡适的文学创作虽然从数量、质量上都比不上同期的作家,但他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观念却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激励并影响着一代代为文学、文明付出努力与思考的人。近代以来落后的中国,如何在文化上与西方文明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流,出身于西方文学、哲学熏陶下的胡适凭借着一腔热情与慷慨,提倡新文学,提倡文学改良、文学革命,以新语言、新词、新语、新的文学规范为入门金钥匙,使人们产生全新的文学思想、崭新的文学观念,从而达到塑造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学的理想。

中国文学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求新求变的态势蔚为壮观,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一波压倒一波地向人们冲击过来,寻根热、弗洛伊德热、魔幻现实主义热等等热点前沿充斥于文学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都以此类“热”为基本标准,从而失却了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把握和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学的本质问题没有自信自觉的体现。当前文学的创作与研究都空前繁荣,但亦是乱象丛生,因此什么是文学、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文学、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等问题恐怕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并深究。

三、《刍议》的启示:思想·创新·批评

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一方面受到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的局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代文学跨度大,历史纵深之极很难把握。对

于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首先要反思近代文学的起点、人物构成等；其次，不仅要把目光集中在文学家身上，还应该集中在哲学家、史学家身上。就胡适的《刍议》而言，其中的“八不”原则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史观研究提供一些颇有助益的参考，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文学真正意义的进步要以作家的心灵、思想建设为先。任何一个文学创作者都要坚定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急不躁，不艳羡他人，不逢迎读者，永远怀揣着文学家的热情与敏感追求自由、追求人生的美好，将自己的人生也谱写成一篇优美的作品。在这样的思想境界指引之下，逐渐形成自己的、能够显著地区别于他人的创作风格，并时刻找到让人眼前一亮的独特视角，如此才能写出文学精品，提升全民族的文学情怀。上世纪前半叶，梁启超、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梁实秋等人通过理论文章、文学史梳理、文学作品在文学思想史观的体系构建上都有很多独到的见地，在那个时代，他们无一不是将社会进步、人生追求合而为一。所以文学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形式的进步，而在于思想内容的进步以及作家的心灵境界层次、思想认识的高度与广度。

其次，文学的突破与创新都要契合时代发展的需要。胡适坚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1]30 时代发展是承前启后，文学的发展更容不得抄袭古人。据他的考察，只有白话文学是“一线相承，至今不绝”。[1]31 白话文经过了两千多年的自由进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勇敢得担当起自身的职责，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改革与变迁，那是当时的时代要求。至今，中国文学经过了西方文论、中国社会曲折进程的洗礼，任何角度的突破与创新理应更加成熟，然而却差强人意。文学逐渐被边缘化的根源即在于作家对当前时代精神的把握不明。文学是人学，文学是社会学，但当前的中国人的心灵、精神状态究竟如何，当前社会的进步与停滞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文学家与文学研究者却都还需进一步认识清楚，真能将时代精神通过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此才是真正的契合当下。

最后，敢于一定程度矫枉过正式的文学批评。胡适的文学思想建设是建立在其文学批评之上，他在行文中多处点到了当时的文坛弊病，甚至点名道姓，一语中的，直指核心。当前文坛怪相不少，而文学批评却是一团和气，碍于情面，不得不妥协让步，虽然也在呼吁“接地气”、“靠近生活”、“先读后评”，但最终导致了文学批评的不给力局面。文学思想史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学评论史、文学批评史，因此要敢于在一定程度上矫枉过正的文学批评，扭转评论界的风气，使文学批评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就思想理论研究层面而言，我们通过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新解读，应该从匮乏的理论知性与理性世界中选择合适的概念范畴，或者借鉴有新意的理论范式，形成与文学史书写对象相契合的文学史观。[6] 随着智能媒体等技术手段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学仍然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打击。电子书、懒人听书、帮你读书、文学期刊等 APP 慢慢进入大众视野，人们不再手捧一书，而是抱着手机就可以看书、听书，尽管这样的阅读战线太长，琐碎时间的利用也冲淡了阅读的完整体验，而且效率不高，很多人都不能从头至尾完整地看完一本书、听完一本书。但文学的吸引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存在，胡适也曾感叹小说的“魔力”。他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说，《三国演义》一书能使妇人女子皆痛恨曹孟德而褒奖刘备诸人，正是体现了小说的魔力之大。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研究者，都身在这股魔力之中，从思想深度、创新程度、批评力度来促进时代文学的建设是《刍议》对当下文学界的最大启发。

[参考文献]

[1] 胡适. 胡适全集(第1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马森. 世界华文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度西潮[M]. 新北：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15.

[3] 朱晓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J]. 中国社会科学，2006(1)：146－156.

[4] 胡适. 胡适全集(第10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5] 植田渥雄.《文学改良刍议》考——关于文学革命[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17－22.

[6] 朱德发. 关于文学史观的建构——答《东方论坛》编者问[J]. 东方论坛，2009(1)：42－51.

[学术编辑 房玉柱]
[责任编辑 李兆平]